

编者按：2010年9月19日上午九点半，在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会议室召开了“《儒藏》精华编主编工作会议总结会”。这次会议是按照教育部社科司杨光司长在8月26日“《儒藏》精华编主编工作会议预备会”上的部署如期召开的。杨光司长亲自到会，社科司成果处魏贻恒处长陪同。北京大学刘伟副校长、社科部李强部长、萧群常务副部长、耿琴副部长全程参会。汤一介先生主持会议，《儒藏》总编纂孙钦善教授、安平秋教授、《儒藏》中心常务副主任魏常海教授、副主任吴同瑞教授、《儒藏》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中华教授参会。汤一介先生就8月28日至29日香山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简要总结，指出《儒藏》工程合作单位和校点者一直以来关心的项目立项及管理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最集中的问题。魏常海教授就香山会后草拟形成的“关于《儒藏》工程合作单位及任务承担者项目认定的建议”进行了具体说明。杨光司长在听取了充分讨论之后作了全面指导性讲话。刘伟副校长就杨司长讲话作了积极回应：一、司长的讲话很有针对性，要求很明确，把《儒藏》精华编的时间、任务都更明确化了，很鼓舞大家，北大有信心把这个工作做好；二、北京大学将在人、财、物几方面鼎力支持；三、北大将不辜负历史重托和教育部、社会各界的期待，集中所有力量，尽全力打攻坚战，遇到问题特事特办，一如既往地支持下去。现将杨光司长的讲话全文刊载如下。

教育部社科司司长杨光 在2010年9月19日《儒藏》 精华编主编工作会议总结会上的讲话

今天的会开得很好。编纂中心提出来的这几条提高质量、加快进度的措施——增加编校费、签合同、立项——大家发言总体上都是非常赞成的，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

《儒藏》这个项目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这是教育部在人文社科方面资助最大、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任务很艰巨也很重要。毛主席过去说过，一件事情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这个项目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必须抓紧抓好。

作为一个学术大工程，我们行政部门要提供支持、服务、保障，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不是说行政凌驾到学术上去，大家不要有这个担心，而是要通过一定的、适当的、必要的行政力量解决一些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推动项目更好进展。我们国家很多大型的项目都是这样组织起来的，没有必要的行政力度支持是很难的，必须统一思想，不能把课题任务一下达就不管了。特别是《儒藏》这样大的项目，涉及面这么广，靠一个学校协调力度不够的时候，行政力量要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必须利用各方面的力量，

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政策问题，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回避。

这个项目不能搞半拉子工程，不能搞烂尾楼。汤先生说了，越拖问题就会越多。我们知道有的大项目一拖就是二三十年，到现在烂尾楼一个，浪费国家的资财，浪费学者的心力。所以说必须下决心，我很同意汤先生、刘校长刚才说的，要切实抓好，2011年底全部完稿，2012年把“精华编”完成。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加快进度。再说我们现在也有基础，已经做到1/3以上了，现在到了一个冲刺阶段，不能半途而废。这个事情我们社科司要统一思想，我们下午回去要开会、商量，项目既然下达了，就要全力支持。我们以前没有搞过这么重大的项目，这个项目搞得好，就将是我们人文社科方面搞大工程、大科学、大项目的一个探索。

这三条措施很重要。加点校点费很必要，合同也很重要，也是一个很有力度的事情。另外就是立项。按照教育部有关立项的办法、规定，还是很复杂的，我个人一直主张尽可能简化这个过程，以免太繁琐，损伤大家的积极性，我们的目的还是在于出成果、出人才。有些事情还是要特事特办，有些常规可以打破，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有利于推进工作出发。

具体到立项来说，虽然2004年已经立过项，但是现在各方面变化都很大。我个人的意见是，现在可以再发一个文。专家们大都建议《儒藏》工程是一个重大项目，下面分成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是基本可行的。20家左右部类主编可以设为重大项目下面的重点项目，40万字以上的校点任务可以设为一般项目，不要再重新填表申报，把《儒藏》工程作为一个大项目管理，最后行不行要看出来的成果质量。发文的时候还要研究一下，承担相应的《儒藏》编纂任务“相当于”或者“视同”重点项目或者一般项目，项目承担者在评定职称、考核等时就可以这样填表，我们承认它，这样就可以得到学校的认可，否则学校没办法落实，目前在上面是重大项目，到了基层却得不到相应的承认。一个重大项目下面20个重点项目，100个左右一般项目。然后签合同，明年年底交稿。这不是一般的项目立项，而是特事特办的立项，是我们组织人文社科大工程的一种探索，一种改革，要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这会为我们积累经验。我们第一次实施这么大的项目，管理办法必然会有一些相适应的变化，这是一种重要的探索，包括签合同，包括这种立项认定的方式，都是如此。任何事情在我看来没有不能变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从实际出发，把事情办好。

另外，刚才大家讨论到的，是先立项还是等初稿审定后再认定为立项，这个具体的技术问题，还可以再商量。也可以先立项，结项以后认可。如果半途而废，审查不通过，拿不出成果，都视同项目未完成。刚才大家反映的项目未完成经费也无法追回这些情况，这都是大工程里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将来针对这些情况也要有一定的管

理办法，比如以后不得再申请项目，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名单，凡是申请项目以后不认真实施的，导致项目不了了之的，一律进入这个名单，学校也应该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

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尽快定下来，也希望编纂中心积极地给予支持配合。你们现在提的八条（按，“八条”指“关于《儒藏》工程合作单位及任务承担者项目认定的建议”内容）可以作为一个基础。另外还有一条，就是离退休的专家仍然可以主持项目，他们是一笔宝贵财富，这个应当明确，但必须是学术造诣高，身体健康，可以实际主持工作，不是只挂虚名。至于退休以后需不需要教育部的项目、需不需要评职称等等，这都是次要的。不管是已经做完的还是正在做的，退休的，没有退休的，在项目认定的时候，重点项目也好，一般项目也好，一视同仁。已经做完的也予以认定，可以写进项目承担者的履历。另外，对研究生等非在岗在编的人员，我建议应该承认他们的劳动，尊重人才，只要能力满足要求，完成了相应的任务，由他们所在的单位或者由《儒藏》中心给他们一个工作鉴定或者证明书，表明他参与了这个项目，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达到了怎样的专业水平，这个东西有用，年轻人干这件事情，除了能够有一定经济收入之外，最重要的是要肯定他们的能力、价值，将来就业的时候有用，这个项目最终还是落实到校点者，要关心他们。

最后一点，要加强中心建设，人员配备，加大督促和协调的力度。在政策上，我们会支持，但具体的组织协调，还是需要北大、刘校长、李部长、特别是中心来实施。明确责任，一定要把任务落实到每个人头上，责任到人，合同签好，明年交稿。另外中心也要进一步加快初审的速度。

总之，希望再有两年，能把《儒藏》“精华编”完成，后面的事情再说，起码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这个阶段性的战役打好，拿出一个不负于时代的精品力作来。

（据会议录音整理）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在 2010 年香山《儒藏》 精华编主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0 年 8 月 28 日)

尊敬的汤先生，尊敬的徐处长、各位专家教授：

大家好！

今天，我们大家汇聚在这里，召开第五次《儒藏》精华编主编工作研讨会，对于《儒藏》这一功在当代、德泽后世、惠及华夏、影响世界的伟大工程，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自 2003 年《儒藏》工程作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立项以来，我们北京大学十分重视。该项目历任许智宏校长、周其凤校长、吴志攀常务副校长、主管文科工作的张国有副校长，现在又由我接任张校长工作，足以说明这个项目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北大的历任领导，对《儒藏》工作都十分关心，亲自过问。从许校长开始，就有亲自登门看望汤先生，了解《儒藏》工作的难处、需求等的传统。我本人对汤先生也充满深深的敬意！汤先生已八十多岁，身体也不太好，他自己别无所求，但总想为国家做成一件大事，填补我国没有《儒藏》的空白，我们真诚地感谢汤先生！。我还要感谢各位及各位所在的大学和机构长期以来所给予的真诚的通力合作。感谢教育部，感谢社科司，一直以来所给予的关注和支持。

教育部杨光司长多年来一直对《儒藏》工程给予特殊的关爱和指导，多次亲临北大看望汤先生，了解《儒藏》的进展情况，听取各位专家对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表谢意。前天下午，杨光司长为今天的会议，又亲自到北大来，说明今天不能出席会议，但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儒藏》工作今后的几项措施布置给了我们，我在此特向大家汇报如下：

杨光司长指出，《儒藏》是一个重大专项，是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磨一剑的重大项目。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已经到了一个大发展的历史阶段。编纂《儒藏》是时代的一种需要，是文化发展的一种标志，也是时代的一种成果，对国家、时代都很有意义。《儒藏》工程是教育部十年来持续最长、投入力度最大的一个项目。教育部非常重视，要不遗余力地支持到底，协助北大搞好这项工程。北大学校、行政、社科部，还有儒学研究院，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多年来共同努力，已经出版 30 多册精华本，成绩很显著。但目前，《儒藏》工程面临着进度和质量的关键时期，我们除增加责任感和

使命感以外，教育部可以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签定三方合同，从法律上为项目提供保障。

（二）适度增加校点费，更充分地体现编纂者的劳动价值。

（三）对责任心强，点校质量高，不出现退改的稿件，要给予奖励。

（四）教育部下文，把所有参与编纂《儒藏》工程的学者，都列入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负责人。

（五）参与编纂《儒藏》工程的各高校领导班子，务必加强对该项目的支持和管理，对参与点校的学者给予条件上的保障。

杨光司长还强调，目前世界性的国学热，儒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怎么样去发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肯定是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和中国的这块土壤是联系在一起的。无数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可能代表着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能够对全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非常不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们希望《儒藏》要往前赶，尽可能出好，出齐。

各位领导和专家，以上是杨光司长的指示。我们今天编纂《儒藏》，不仅是为了保存文化遗产，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的多元性，为不同文明体之间的沟通、对话，为建立一个有人文关怀和价值导向的全球化，提供一个有别于西方思维方式的文明参照系，以便使人类以更加理性的态度，进入一个多极共存与和平发展的二十一世纪。我深信，通过到会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讨论，编纂《儒藏》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及其文化价值、学术价值等，会得到更加充分的揭示和论证。

我们北大牵头做《儒藏》工程，就是想为中华民族做一件好事，做一件大事，并且一定要做成精品。要把《儒藏》做成精品，我以为以下几点十分重要：首先是提高质量，提高学术水平，保证进度。其次是以深入研究为基础，只有深入研究，才能使《儒藏》在学术上立于不败之地。第三是把严谨的精神渗透到编纂的各个环节，包括底本的选择、校勘的细致、校记的撰写等，都必须追求卓越，求其上上。第四是严格把好出版关，初审、复审、终审，一校、二校、三校，尽量把错误消灭到最低点。

北京大学自承担《儒藏》工程以来，就有坚持不懈的信心和一贯的努力。现在，在教育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更有责任感、使命感和信心，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和人类的进步做出一份贡献。所以，几十年之后，回头来看今天的作为，我们将会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的。

最后，预祝此次“《儒藏》主编工作研讨会”圆满成功！对各位专家学者在百忙中莅会再次表示感谢！

《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汤一介在2010年香山《儒藏》 精华编主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0年8月28日)

在座的各位主编很多都是我们长期工作的老朋友，而且不仅仅是在儒藏这一阶段的老朋友，有很多都是在儒藏工作以前就是老朋友。刚才教育部的代表把教育部的意见讲了。杨光司长在前天跟我们开了一个会，原来我是说我去教育部做个汇报，杨光说还是他来吧，我本来也是说少数几个人谈谈，后来去的人多一点，就算一个预备会吧，所以那天就等于一个预备会。杨光司长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刚才刘伟校长已经讲了，徐处长也作了些补充。所以教育部的意见已经都比较明确了，刘伟校长代表学校讲了学校的意见与学校对儒藏的支持。

我们今天为什么再开一次主编会，虽然去年开过一次会议，那次会议是把各个学校的社科部的部长，还有一些主编都请来了，那次会议主要是关于讨论怎么样把协调搞好，各个处长他们有些什么意见，也讨论一些其他问题，但是经过这一段，发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地解决。从主编会来讲，去年那次不能算是正式的主编会，有些具体事务不好在那次会上商量。所以儒藏中心觉得需要开次会，而且有些主编也要求再开次会，来解决一些目前的问题。

开会的议程已经发给大家，议程是根据儒藏中心这几年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是根据各位主编所提到的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的一些想法。当然，这些想法、我们所起草的一些文件是不是非常适合，今天下午和明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在讲这些具体问题之前，我想说一下，教育部最近要求儒藏中心写一材料——儒藏从文化建设方面有什么重大的突破，要我们写这样一个东西。清华已经写了，主要是关于他们的清华竹简可以取得的重大突破。那么儒藏到底可以取得什么重大的突破呢？实际上儒藏对国内和国外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儒藏中心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和多次修改，写成了一个报告，提交了教育部。教育部当然会再作通盘考虑，作一些修改、补充再发。发下来之后我们会以简报的形式送给各位主编。

我们想到的儒藏总体上可以取得的重大突破有四点。儒藏不仅仅是精华编的问题，

还包括大全编在内，才是一个完整的儒藏的工程。所以我们认为，第一，儒藏具有传承文明，添三藏新典的意义。这就是说，在将近五百年里，中国学人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在我们这一代，应该完成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大家知道，明清两代都提出过要做儒藏，但都没有做，明朝的曹学佺提出，“二氏有典，吾儒何独无？”佛藏和道藏都有典，为什么儒藏没有？因此想做儒藏，使得儒家的文化、三家都有典，那不是很好吗？可是没有做，因为很快明朝就亡国了，结束了，没有做成。清朝周永年也作了《儒藏说》，而且也作了些规划，最后也没有做成。近代也有学者提过要做儒藏的设想，这位学者就是饶宗颐先生。饶宗颐先生跟我谈过一次，那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比较早。他就说到我国有佛藏，有道藏，为什么没有儒藏，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他当然也还没有希望二十一世纪开始我们就做，他也没有想过能那么快，所以当代实际上也有人提到要做儒藏。

我们建国已经六十年了，回顾这六十年的过程中间，应该有一些大的文化工程来说明这个时代是在不断地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立项的国家项目是《中华佛藏》，花了七年时间，集中了七八十位学者来完成。这部《佛藏》应该说做得不错，它以《赵城藏》为底本，但是把其他的藏经尽可能地用来补缺，大概有十来部其他藏经，比方说《碛砂藏》等都利用了。而且印得也比较不错。但是使用起来不方便，因为它是一个影印本，而且价钱也很昂贵。应该说这是一个做得相当不错的东西，而且集中了七八十位学者、花了七年的时间把它完成。这件事情是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任先生在他的最后一两年要做续藏，当时找我谈了两次。他就说，做续藏就不再影印本，要做标点排印本，这也是吸取了《佛藏》的经验，因为影印本少数人可以利用，大多数人都没法儿用上，因此要做标点排印本。这个工程非常巨大，正藏大概一百二十本，续藏最后应该超不过一百二十本。

还有一个大的工程就是《中华大典》。在座的有些学者也参加了这个工程。最早我就是参加《中华大典》的编委之一，但是后来没有继续。《中华大典》八十年代就想做，由于经费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但全部还不知道会拖到哪一年才能完成。所以一个大的工程，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很难比较顺利地做完。《中华大典》现在国家给了它投入，但是有二十年没有任何投入，所以进展非常慢。

还有一个就是道藏。解放以后出版过三部《道藏》。一个就是把《正统道藏》再加上《万历续藏》，把它印出来，叫作《中华道藏》，这个是由道协来作经济上的支持，由社科院宗教所来承担，当然也不只是宗教所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单位共同承担这一任务。但是《道藏》毕竟不大，共出了四十六册。还有一部书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叫《道学全书》，我挂名作主编，实际上主要是由我的学生张广保在做，这个有六十册，比较大。

这是因为在编了《道藏》之后,又编了一部《藏外道书》,有三十六本。影印本的正编《道藏》有三十六本,这个《藏外道书》也有三十六本。这些都是重大的学术工程。

但相比之下,儒藏的工程要比它们大得多得多。不要说大全本,精华本编出来一共是三百三十册,数量超过佛藏和道藏。如果再做大全本的话,恐怕要一千五六百册才够。所以如果儒藏能在我们这一代真正完成,那么对中国对世界都是重大的贡献。而且我们的做法是采取标点排印本来做,再加上校勘记,这就便于大家使用。在做《中华佛藏》以前,大概82、83年,李一氓找我谈话,问我佛藏该怎么做,当时我的意见就是做标点排印本。我跟他讲,因为从《开宝藏》开始,中国一共出了二十五种佛藏,虽然散失颇多,但也保存不少,朝鲜出了两种,日本出了六种。若我们再出影印本,当然从文物价值上来说非常大,因为《赵城藏》仅有一部,把它影印出来意义非常重大。而且现在《中华大藏》是超过了赵城藏,因为它把《赵城藏》所缺的别的藏经补进去,所以它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但它使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做佛教研究的学者,大部分还是使用日本《大正大藏》,因为日本《大正大藏》有句读,有校勘记,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当时我就跟李一氓同志讲,是不是可以做标点排印本。他就问我一句,人在哪?你有没有人来做?确实是没有多少人来做,这样的经费要比影印本多得多,那是刚刚80年代初,不像现在的国力这么强,就没有用这个建议。现在续藏经就准备用标点排印本。其他影印的还有很多,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都已影印,最近我也看到了山东大学《两汉全书》已经出版的消息。所以从建国以来,我们对古书的整理确实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无论多大,恐怕没有比儒藏再大了,我是说包括大全本在内,没有比儒藏再大的了。《四库全书》本身收了3500多种书,我们精华编只收了六百多种,可是儒藏的重要典籍大概都已收在精华编中,如果做大全本,当时我们的计划是收六千部书,超过《四库全书》的数量。

而且从中国历史传统讲,儒学一直是居于主流地位,它对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学术流派。在五百年的一时间里一直没有做,到现在我们似乎是应该做。做《儒藏》,一个是我们国家需要,我们国家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从历史文化中取得资源,才可以建设和谐社会;也是世界的需要,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期待。现在有一批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可以对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因为前一段时间北京图书馆要成立一个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他请我去作一次演讲。我就花了一两个月时间了解了一下国外当时有什么新的东西。我就讲了一下海外中国学的三个新视角。一个新视角就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些专家,他们逐渐认识到在中国文化中间存在着一些带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而这最早是在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开的一次宗教大会,各种宗教领袖都参加了,还有一些学者参与。在这个会上发表一个全

球伦理宣言。伦理宣言讲了很多，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讲到底线伦理，就是最起码的伦理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就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定为底线伦理的第一条，而且叫做道德金律。这是在芝加哥大会上讨论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各国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在欧洲叫汉学，其实在美国往往叫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现在在西方逐渐地也叫中国学。研究中国学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要解决中国的现实，了解、研究中国的现实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是研究中国的一些带有理论意义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有些问题上是有它的普遍价值的意义。比方说法国的大儒汪德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了三个基本命题。一个讲，“天人合一”思想可以为解决当今人类生态危机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他提出的第二个命题，就是孔子的“远神近人”思想可以对解决宗教的“完整主义”起到一定的作用。关于完整主义的问题是基于基督教，上帝创造世界已经完美，这很可能缺乏一个发展的观念在里面，其实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除非上帝不是一次创造，而是多次创造才可以，所以它有一个完整主义的问题在里面。所以他说“远神近人”思想可以补充西方宗教的不足。完整主义的问题徐友渔有一篇专门的文章来研究它。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问题，“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问题牵涉到中国对于世界的看法。中国是主张“天下”，世界整个是一个天下，西方则是讲国家，我们是讲天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不同。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安乐哲、郝大维写的一个书叫《通过孔子而思》。《通过孔子而思》有一个基本命题，主要是针对西方人权问题提出问题，西方人权问题已经是相当完美的观念了，因为西方提出了“天赋人权”，最根本的意思就是天给了人一个基本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有充分发挥他自己的个性的自由权利，而且应该保护他能够自己发挥他的个性。每个人自由的个性发展非常重要，如果不能有自由的发展的话，就没有办法创新。所以我写过两篇文章，就是讲自由是一种创造力，只有自由才有创造，没有自由是没有创造的。但是他认为这个人权的问题也有一个问题，他只讲到了权利的方面，而没有讲到责任的方面。有权利还有责任。所以他认为中国的“礼”，“仁义礼智信”的“礼”可以补足西方的人权观念。中国的礼主要是说先秦原始儒家讲的“礼”。但“礼”实际上包括一个对等的关系，父慈才能子孝，君义才能臣忠，兄友才能弟恭。它是有一个双向的权利和责任关系。所以他认为“礼”可以解决西方的人权问题的不足。

我想这些例子很多，特别有一个例子是把中国的儒家思想跟基督教套在一起。有一位法国学者叫爱德华，是索邦大学的教授。他认为孔子的思想是有他的信仰、希望和爱。实际上这是西方基督教的信、望、爱。基督教讲信、望、爱，信仰、希望（hope）和仁爱。他认为孔子也有信、望、爱这三点，跟西方是对应的。而且最后加上一句，

他说孔子这个思想有普遍性。

所以西方学者已经在看到中国哲学中间确实含有一些对解决当前人类遇到的（问题）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而刚刚举出的那些东西都是来源于儒家的思想。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现在逐渐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原来的目的是要消解现代性，把它解构掉，这是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九十年代很多重要的西方学者都在做这个问题。从九十年代末、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开始，出现一个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建构性的后现代对解构性的后现代有个批评，认为他们确实提出了现代性、现代社会中间发生的一些问题，但他们并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到底我们将来怎么发展。那么他们提出了两个基本的观念，这两个基本观念实际上是从过程哲学（Whitehead, Process Philosophy）当中发展出来的。一个观念就是把宇宙看成一个整体的、不断发展的、有机的世界。另外一个基本观念是人和自然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那么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是基于这两个前提发展起来的。我看到他们的一些文章，直接就讲到他们是和中国道家的崇尚自然的思想和儒家的注重道德修养的思想是有关的。他们说，第一次启蒙是解放个人，现在应该进行第二次启蒙，就是关心他者，关心差异。所以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应该在二十一世纪发挥它重大的作用。当然，我们必须关注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发展，而且我们必须认真地吸收、学习和融合其他的文化，这是决不能忽视的。如果我们只是认为我们的文化已经非常完美，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必须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来丰富我们自己才可以。那些说法我都是不同意的，“中国文化拯救世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是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对话中共同发展。但是无论如何，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那么长的历史，那么大的影响，必须在其中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编纂儒藏这部大文库的重大意义。我们担负着这个重任，因为建国六十年了，我们必须来做，必须在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它，这要靠大家。我已经八十三岁了，至于我不能完成，这是个小事；靠大家完成，这是个大事情，重任都在大家身上，完成这样一个跨时代的任务。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完成这样一个使命，这样才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对得起我们的后代，对得起现在的中国人民和世界。所以饶宗颐先生为我们这个工程写了一幅对联，叫做“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时中”，《孟子》讲时中，《中庸》也讲时中，我们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协太和”，要帮助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帮助世界建设和谐世界。这是饶宗颐先生对我们的希望，我们也不应该辜负老一代的学者对我们大家的希望。饶宗颐先生现在已经九十五岁了。

第二个我想到的我们的工程不同于我刚才提到的其他工程的意义，我们这个工程是一个国际性的文化合作工程。我们没有叫“中华儒藏”，我们就叫“儒藏”，是因为

儒家思想不仅仅是在中国发生重大影响，而且是在韩、日、越三国发生重大影响，79年或80年初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到中国，我们和他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在那个座谈会中间有重要的学者，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后来我们还跟他照了相。他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说孔子和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你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东亚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后来我在北京大学论坛的研讨会上问户川芳郎，就是现在日本参与我们儒藏编纂工作的组织者，他也同意（孔子和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中国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是东亚的宝贵精神财富。所以我们与日本、韩国、越南学者进行了合作，可以说是不仅从建国以来，恐怕可以说是从历史上来说是很少有的那么大规模地和其他学者共同来完成一项大项目，这恐怕是没有的。当然在佛经的翻译中间有过一些先例，比如说玄奘所组织的道场，翻译了一千多卷佛经，是有外国人参与，但是没有我们规模大。因为我们现在日本、韩国与越南参加我们这个工作的一共有几十个学校，一百多人，所以这样一个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应该讲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要编儒藏大全本，他们不会是几十家、一百多人，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经验是，如果要做好，是必须联合日本、韩国、越南的学者一起。我想举个例子，比如说皇侃的《论语义疏》，应该讲我们做的比较好，但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好。原因就是日本藏有《论语义疏》的手抄本就有三十六种，我们并没有一一见到。如果我们能见到手抄本的三十六种，我们的质量会更高。为什么呢，这个限于我们的人力和财力，如果我们有人力和财力的话，这三十六种我们都可以去看，现在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有些是藏在他们图书馆里头，或者寺庙里头，或者藏在个人手里，需要一个一个去看。所以它是需要人力和财力，才能完成这个项目，这个事情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如果是要做得更好的话，那需要更大人力和财力的投入。也可以顺便说一句，比如说《中华大藏》，《赵城藏》里缺了很多种，有的在台湾，有的在其他国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法显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一次慕尼黑大学请我去访问三个礼拜，我就利用这三个礼拜跑了一些图书馆，偶尔在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发现恰恰有一部《赵城藏》的《法显传》。那么你必须广泛地去了解海外到底有哪些东西，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巴伐利亚图书馆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图书馆，我们去的常常都是些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图书馆。你真正想把《儒藏》这部书做得非常非常完整地话，需要花很大的人力和资源才能做到。我们现在是尽量努力做，所以把日本的部分包给日本学者，他就比较方便了，他可以去跑。那么韩国包给韩国，越南包给越南，再到我们这里来统稿。所以这个工程的意义可以说是来尝试做成一个大型的国际合作，从这里总结一些经验。

另外我们还讲到一点，收书的范围突破传统，出版形式适应现代，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去多说。第四点就是版本的选择和标点。但是我觉得，有上面两点，如果我们做好了，第一，是给人类、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这个贡献是在我们这一代完成的。如果我们能够完成，对得起前人，对得起后代。第二，为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创造有意义的经验。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我想讲讲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会议日程已经发给大家，主要讨论三个大的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了适应我们国家形势的发展，我们准备酌量地提高一点校点费，并且加上一些奖励的制度。这个也得到了杨光司长的认可。在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的时候，他来了，我们跟他讲要提高校点费。我们的每一个校点者应该是很辛苦地在做，但是做得并不一定没有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比较好，教育部的经费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支持，校点费应该可以相应地提高一点，我们想把最高的校点费提高到八十块钱，其他的相应都是提高二十块钱。同时还做一点奖励的办法。比方说按时、按质量要求交稿，再奖励二十块钱。我想这些问题是我们要进行讨论的一个方面。我们不是为了金钱，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每一个校点者应该得到的报酬，不应该不考虑到校点者辛苦劳动应该得到的报酬。我们过去的经费也不太充足，无法给校点费有大的提高。实际上现在的经费与我们的预算还有差距，预算是四千多万，现在我们拿到的跟预算还是有些差距。第二个是要签订三方合同。过去我们和各位部类主编签过儒藏中心与主编的（合同），但是我们没有和每一个校点者签订合同。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所有的校点者都是由部类主编选定的，不是我们选定的，应该是校点者向主编负责，主编向我们负责，是这样一种关系。现在看起来这是我们的疏忽，应该是三方来签订合同。校点者、部类主编和儒藏中心，各有要求，要求明确了，就像刚才所说的杨光司长的意见，可以有一种制度性的要求，这样就比较操作。签订三方合同，便于儒藏中心进行工作，便于各位主编进行工作，便于校点者进行工作。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签订三方合同来解决它，这是等会儿我们要讨论的一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也是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校点的质量和进度的问题。现在我们的总体进度情况，我想稍微简单地说一下。儒藏精华编所收的书一共是四百六十一一种，不包含第二百八十二册，即现在正在编的出土文献这一册。这一册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多的，从汉简到新出土的竹简，很多东西。四百六十一一种中已经交稿的有二百八十八种，占62%。已经正式出版的七十三种，占16%。目前已经进入流程中间的稿件一共有二百七十三种，占总量的46%。已经发排的稿件有七十九种，占流程中间稿件的37%。在退改过程中的稿件有44种，占流程中间稿件的21%。其余九十种稿件占流程中间稿件的42%，它是处于正在审稿或者复审的过程中。由于每类交稿的进

度不一样，参差不齐，有些是全部交稿，例如诗类，这要感谢山东大学，他们是全部交稿，而且质量很好，相当不错。也是由山东大学承担的谶纬类也交稿了，但是还多少有些问题，需要我们来商讨一下。小学类交的也不错，属于中等，但不像诗类是全部交稿。有几种是交得比较少，像子部杂学类，交了一些，但是质量都有些问题。有些是交得非常少，像史部只交了两种，占四十八种的4%，是比较少的。所以希望各位主编抓紧交稿的进度。原来定的希望是2012年全部完成，出版会晚一些。但现在看起来，如果这样一个交稿进度的话，是无法完成的，希望各位主编加快一些速度。如果我们签订了三方合同，一定会更好一些。

关于稿件的质量和进度问题，我们是一再明确过，无论是质量还是进度，校点者是第一责任人。至于主编，和我们中心，当然要尽力把它做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无论如何校点者是第一责任人。关于校点的很多问题，过去我们发过一些材料给大家。现在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正在反对所谓学术的不正之风，有一项就是抄袭的问题。我们也发现个别稿件抄袭的问题，这就很不好。当然不一定是全部抄袭，但相当一部分是抄袭。将来哪怕只有一部分是抄袭的，人家只要指出来，我们就很被动。关于质量和进度的问题，待会会有专门的讨论，希望大家注意。

我想我讲的时间也比较多了，我就讲这些。首先是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会议。我希望我们能通过这次会议来充分地交换意见，让下一阶段的工作能够更顺利。希望大家能够保重身体，实际的担子都在你们身上，这个工程能不能完成要靠各位在座的专家们。因为我看大家都是四五十岁的年纪，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的复兴，像我这个年龄的应该是退伍的老兵，希望在你们身上。希望大家注意保重身体。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2010年香山《儒藏》精华编主编工作会议纪要

(2010年9月)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于2010年8月28至29日在北京香山召开《儒藏》精华编主编工作会议，商讨如何进一步提高《儒藏》编纂质量、加快《儒藏》工程进度问题。教育部社科司规划处徐青森处长、北京大学刘伟副校长、《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出席会议并讲话。北京大学社科部、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有关负责人以及全国二十家合作单位的主编出席会议。

刘伟副校长在讲话中指出，编纂《儒藏》是一项功在当代、德泽后世、惠及华夏、影响世界的伟大工程。自2003年《儒藏》工程作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以来，北京大学作为牵头单位对此十分重视，北大历任校长许智宏校长、周其凤校长以及吴志攀常务副校长、张国有副校长都十分重视该项目，现在又由我接任该项目的主管工作，这都充分说明《儒藏》工程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教育部社科司杨光司长多年来一直对《儒藏》工程给予特殊的关爱和指导，亲自了解《儒藏》的进展情况，听取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对此我们深表谢意。这次会议召开前，杨光司长又亲临北大召开预备会议，为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杨光司长让我转达，《儒藏》工程作为教育部的一个重大专项，是需要十年磨一剑、甚至是需要更多时间精心打造的重大项目。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阶段，编纂《儒藏》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时代的成果，更是文化发展的一种标志。教育部对于《儒藏》工程非常重视，将帮助北大搞好这项工程，并不遗余力地支持到底。为了保证编纂质量，加快工程进度，教育部可以采取几项新的措施：一、支持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与各位主编及校点者签订三方委托校点合同，从制度上为项目提供保障。二、教育部将加大经费支持力度，适度增加校点费，更充分地体现校点者的劳动价值。三、对责任心强、校点质量高的校点者，要给予奖励。四、教育部将下文，把所有参与《儒藏》工程的合作单位负责人，都列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负责人。五、将继续要求参与《儒藏》工程的各高校领导班子，务必加强对该项目的支持和管理，为参与校点的学者提供充分的条件。刘伟副校长表示，在教育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自承担《儒藏》工程以来，就以坚持不懈的决心做出一贯的努力，要把《儒藏》

做成精品。目前《儒藏》工程正处于提高质量和加快进度的关键时期，我们要以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中国和人类的进步做出一份较大的贡献。刘伟副校长最后对各位专家学者在百忙中莅会表示衷心感谢。

徐青森处长在讲话中指出，《儒藏》工程作为教育部的重大专项，是教育部投入力度最大、支持时间最长的文科项目，也许不止十年，甚至要二十年、三十年长期支持下去。《儒藏》精华编已出版36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教育部建国六十周年成果展示的最大亮点，受到教育部、财政部领导的充分肯定。我们还要持续不断地向财政部呼吁，争取更多的经费支持。他对杨光司长的意见作出解释：之所以要签订三方合同，是为编纂《儒藏》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以减少法律上的纠纷；之所以提供经济上更多的支持，是为了体现对学者劳动的尊重和肯定，一部好的校点作品不亚于一部学术专著。这次会议主要研究解决《儒藏》工程的质量和进度问题，他希望各位专家学者集思广益，用足有关政策，形成文件，会后由教育部给各合作高校发函。他还希望，北京大学要本着出成果、出人才、出经验的精神，不断总结《儒藏》工程的组织管理工作经验，以为教育部主持的其它重大科研项目提供借鉴；要加强《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作为科研中介机构的人员及组织力量，提高团队的管理水平；还要大力培养和储备中青年科研人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办一些进修班、短训班，为未来储备人才，为编纂《儒藏》大本做准备。

徐青森处长还就合作单位主编及校点者普遍关心的项目立项及管理问题作了说明。他着重介绍了两种项目立项及管理的模式：一种是扁平化的立项和管理模式，由教育部分别给每位校点者下达立项，校点者直接向教育部负责，但在科研组织和管理上有困难。另一种是金字塔式的立项和管理模式，比如说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里边，以子课题负责人的形式列明各个子课题的负责人，作为统一的文件下发；同时在子课题负责人下，再分别列明“孙课题”的负责人，也就是校点者。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项目本身具有相对的刚性，而研究（包括人员）是动态的，几年做下去，人员会有一些变化，这里应再有一张孙课题负责人的名单，下发文件时，把考核要求也直接向各学校提出来。《儒藏》作为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家都知道它的分量；然后子课题的负责人应该比照什么样的项目级别来确定，然后孙课题的项目负责人应该比照什么样的项目级别来确定。但是这些东西即使我们发了文，比如说以会议纪要的名义，教育部的名义，社科司的名义，发下去，它仅仅是一个建议性的。因为学术评价的自主权从来都不在教育部而在各高校，这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对于每一个老师的具体考核、评价、工作量的计算，不可能都由教育部来发文认定。

徐青森处长最后还指出，关于质量和进度，《儒藏》工程要有自己的目标定位，要

有所为有所不为，其目标应是：第一，较之前人，在学术研究上应有所推进，但不追求终极完满的成果；第二，较之今人，在学术传承及文化传播上应有所贡献，让当代研究者及大众可读、可用；第三，对于后人，在学术发展上应有所启迪，让未来的研究者重视我们的工作成果。因此，《儒藏》工程应该是一项能够体现时代水平和当代最新研究成果的“继承性创新”或“共识性创新”。

汤一介先生在讲话中指出，《儒藏》工程的开展在四个方面取得学术文化上的重大突破：一是编纂《儒藏》以传承中华文明，是符合当代中国以及当今世界的需要。一方面，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而历史上有多种《佛藏》和《道藏》，却没有《儒藏》，明清两朝都有学者、当代也有学者如饶宗颐先生，都曾提议编纂《儒藏》，因此这项工作是五百年来中国学者未能实行的一项历史使命，现在应该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而且中国目前提出建构和谐社会，儒家学说也可以为此提供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欧美多位汉学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通过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研究，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具有互补性，对西方乃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后现代问题具有建构性，能够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二是《儒藏》工程还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项目。历史上，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主流文化，而且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日本当代一位有影响的学者曾指出，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精神财富，而且是东亚的精神财富。《儒藏》工程目前已与韩、日、越等国学者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国际学术文化合作项目，已经超过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国际合作——如唐朝玄奘取经、译经的规模。三是《儒藏》的收书范围突破传统。《儒藏》不仅收录传世文献，而且收录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这种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的做法，在中国古籍整理编纂史上还是第一次。四是《儒藏》的编排形式也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儒藏》精华编收录的文献，经过简明校勘及新式标点，以繁体、竖排的方式印刷出版，最终还将制作成可供全文检索的电子文本，便于阅读和利用，能够更好地满足文化遗产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汤先生动情地说：“我已经八十三岁了，我个人能否看到《儒藏》的全部编成是小事，但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有义务完成这项历史使命，这要靠大家共同努力，这样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后代，对得起中国人民和世界的期望。”汤一介先生还向会议报告了《儒藏》工程的总体进展情况以及质量、进度等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同瑞先生向会议报告了《儒藏》工程的财务状况及经费使用情况。他指出《儒藏》工程尽管得到教育部、北京大学以及各合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但仍然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因此在经费使用上应该精打细算，

同时还必须想办法开源节流,争取国家和社会更大的支持,以为《儒藏》工程的最终完成提供充裕的经费保障。

与会代表对于教育部即将出台的《儒藏》工程激励措施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大家对于如何提高编纂质量、加快工程进度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一、关于质量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孙钦善:今天上午讨论两个问题,质量与进度,其中质量是核心。《儒藏》的成败在于质量。季羨林先生生前、汤先生、我们参与者都感觉到质量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有学术良心,特别是在学风不正的环境下,把《儒藏》质量搞好。

沙志利(北京大学):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退改率高。目前在流程中的稿件(不含已出版),有184种做完了初审处理,其中一次通过的有57种,有127种至少退改过一次,退改率高达69%,还有不少稿件退改过2次,少数退改过3次。退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底本校本选择不当。换过底本的稿件共计有44种之多,占已交稿件288种的15%。二是标点校勘的问题。有三四种稿件,审稿人改了有上千条之多,有校点问题,也有操作上不合体例的问题。三是稿件与已有整理本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吸收成果与避免抄袭之间的关系。质量差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校点者态度不认真,或者是水平问题,可以通过多查多问,可以解决,所以措施中有相应的限制。二是主编把关不严格,未经审读、签字就交稿。

陈恩林(吉林大学):稿子的质量问题主要还在点校者,点校者对于所点校的书起码有较深厚的功底,不然,不可能做好。

孙钦善:标点问题有学问,整理儒藏,校勘与标点,都涉及到理解,文献学是基本功,所以标点校勘不是小问题,是学术问题。

林忠军(山东大学):周易的点校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易类的退改率比较高,有两个原因,一是专业性太强;二是我们作为研究者,对于古籍整理的体例有些不太熟悉。点校周易,既需要古籍整理者的规范,又需要研究者的专业知识。

王承略(山东大学):底本一旦选定,尽量不要改来改去。选择底本的原则:一是比较早的本子,一是精校精刻本。这是总原则,但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四库全书本,有时候反而比其他的底本要好。怎么选底本,一是调查版本,一是通过校勘。校勘记,我一直强调少而精,不要罗唆,因为我们是丛书,与单书整理不一样。我作为主编还有改良之处,具体的说,有几条,一是我让别人挑简单的,我自己做难的。大部头、没有过整理本的我自己做,因为主编最熟悉整理体例。二是作为主编,开通email、手机,有问题随时解决,业务辅导要跟上。三是敢于废掉成稿,我们有好几部稿子换人了,象《慈

湖诗传》、《诗三家义集疏》换人了，原来的稿子校点者只能挂名，不拿稿费。后来的整理者署名在前，拿全部稿费。

王承略：关于抄袭的标准，我觉得有三点很重要：一是抄袭整理说明；二是照搬标点，包括错误的标点；三是照搬校勘记，不注明出处。如何避免抄袭？一是找原整理者，按照《儒藏》体例重新改过；二是抽换底本、校本；三是改正原书的错误；四是可以引用原书的校勘记，但要注明出处。

赵伯雄（南开大学）：抄袭，我的意见，不要刻意地与原整理本不同，比如说，底本，原整理本很好，我们为了不一样就换底本，不一定可取，要看是不是可以，我的观察，原整理本对版本有一定的调查，一般还是不错的，我们再整理，还用原底本就可以了，关键是改正原来的标点错误，哪怕一卷改几处，就行了，就比原整理本高。别为了避免抄袭嫌疑，刻意做一些工作，未必可取。

王承略：前人整理本往往较早，一般在2005年之前，见不到《续修四库》《再造善本》，在选择底本方面我们是可以超越的。但象赵老师说的，有些唯一精善之本，就不必刻意去换。

赵伯雄：版本这东西，我们不是要弄一传世的，将来就没人超越了，这不是目的。丛书与单书整理不一样，方便读者阅读，不必求特别稀见的版本，不宜过分纠缠，工作量太大，没有必要。

王承略：中心应把底本的选择与主编好好协商，不要轻易定，也不要轻易改，以提高质量与速度。

魏常海：我们原来有个很好的措施，就是交样稿，看校点说明以确定底本的问题。现在退改，相当比例就是因为底本不好。如果主编与中心都把关，样稿底本与体例合格了，退改率会减少一些。目前真正交样稿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是导致退改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交样稿并不费事，希望主编多把关。

魏常海：校点者作为第一责任人，有责任版本调查。中心如果每一种书都作细致的版本调查，也不可能。我们现在提出的更换底本，大部分可能对，也不一定完全对。我们也在反省，有些误区，有时候根据校勘记的异文校直接判断优劣，因为校勘记中不显示底本正确校本错误的东西。版本调查是确定底本最重要的，校点者应该做，做一本书并不困难。如果说都集中到中心来做，不可能的。现在我们也加了一个要求，我们的初审人，大都是博士生，初审稿件，必须单独写一个版本调查意见。如果保证交样稿，校点者调查，主编把关，初审人再调查，就会降低退改率。既然你校点这本书，中心提供参考意见，但校点者必须确定底本校本。还是校点者必须做底本调查，校点说明必须以此为基础，主编、中心再把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减少退改率。

王承略：中心丧失了一道非常重要的程序：版本调查，包括底本，校本，参校本，新整理本。

孙钦善：第一责任人是校点者，第二是主编，然后是中心，关于底本选择，如果有样稿，绝不会换底本。这次强调，交样稿前，除了调查版本，还要调查已有的整理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意见分三类：一是做得很好，没法超越，我们就找原校点者，商量版权；二是整理得很好，参考得较多，但还可以超越；三是错误很多，肯定不行。为什么宋本好？因为宋本没有经过明人乱改。明人刻书，乱改；清人编《四库》，也是乱改，这要一分为二的看。《儒藏》为方便使用，不避繁难，采取了标点加校勘记的方式，学术含量特别大，容易出硬伤。今天的新问题，就是在吸收前人成果方面，要小心，避免抄袭。

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关键是各部类主编责任心怎么加强的问题，应该想办法。除了加强主编的责任心，校点者的情况大概是两类人，一类是比较年轻的点校者能作为教育部一般项目的承担者，可能对年轻人有促进作用。另外一部分，教授博导，事情比较多，是不是可以把一些人请到北大来做，一个月就能做完，来不了或者派一个监军过去，然后在《通讯》里通报。

吕文郁（吉林大学）：书类的校点者，是老中青三结合。老先生固然是宝贵财富，但情况也不尽然。中年人原来比较倚重，但成了包工头了，包给学生，只是签名，看看稿子。现在倚重博士生，退改率比较高，一是《尚书》已有整理成果的很少，二是功底差一些，比较吃力，但博士生就是搞古籍整理的，所以必须过这一关，虽然不理想，等于实践中学习，对本人有锻炼，这些人还要继续倚重。以后选人不见得老先生就好，应该充分发挥年轻人的积极性。

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我就让博士生做校点，论文就做这个题目，一举两得，也是个培养方法，整理比较早就交卷了，论文也是北京市优秀论文，这种方式可以推广。

严佐之（华东师范大学）：刚才的问题，一是质量问题，一是进度问题。质量和进度，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学术层面的问题：版本，校点。一是管理层面的问题：要出重大项目的管理经验，现在要做的就是总结管理经验。在座的都有做大项目的经验，像《两汉全书》《子海》《朱子全书》，都总结过经验，如主编责任制，三审制，这是直接的管理。《儒藏》碰到的是前所未有的管理模式，中心下面有部类主编，很多项目的综合，下面有子项目，需要我们创新，关键在于中心与主编如何沟通：理念的统一，执行的坚决，责任心的加强，这方面有很多经验教训可谈，讨论应着重这方面展开。主编应负责，选定校点者，选定版本，应该把关。主编有很多无奈，中心应该再把关。主编可以反映底层的很多问题，中心的措施没有针对性，应尽量反映，以便中

心采取更多措施。加钱固然好，但很多问题已不是加钱能够解决的。卫平说的，一般项目，可以考虑。主编的责任，是不是可以把每个部类的项目都作为教育部的重点项目。去年的会议，反响不大，但如果把每个部类作为重大项目，这样学校的支持会大一些，我们的调度也会更好做。儒藏中心向教育部反映时能不能在不同层面，学校层面上得到实惠，我们的推动也更有把握。中心与主编的沟通上，很多问题还是老问题，主编可以与中心的理念有不同，像选择底本上，但是一旦确定，主编还是应该按照中心的体例来执行，签字审稿必须确实看过，在主编手头曾经处理过的情况，每个稿子有个意见。主编能力有限，但要有更细的措施来落实下来。

二、关于进度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沙志利：《儒藏》精华编共有 461 种稿件（不含第 282 册，不含域外部分），已交稿 288 种，占总数的 62%；已出版 73 种，占总数的 16%。目前进入流程的稿件共 213 种，占总数的 46%。其中已经发排的稿件有 79 种，占流程中稿件的 37%；在退改中的稿件有 44 种，占流程中稿件的 21%，其余 90 种稿件（占流程中稿件的 42%）在进行审稿或审稿复核的工作。每个部类的交稿，从汇总表中可以看到，进度也参差不齐，有全部交稿的如经部诗类、讖纬类、小学类、子部杂学类；有快要交全的，经部易类差 2 种，礼类礼记部分差 1 种，儒学经济差 1 种，儒学性理上海师大差 1 种；如有几乎未动，如史部只交了 2 种，占总 48 种的 4%；子部儒学类礼教之属只交了 1 种，占总 9 种的 11%；集部金元类交了 2 种，占总 12 种的 17%。总的看，审稿进度慢，还可以从交稿计划上看起来。在确定校点者之初，曾经让每个部类列一个交稿计划，大多稿件都定在 05 年、06 年交稿，如今这个计划早已过时。后来中心又组织过多次催稿，给每个校点者打电话，确定交稿时间，这种方法能催上来一部分稿件，但效果并不理想。今年 4 月份，责任编委又联系每个校点者确定新的交稿时间，根据当时的统计，有 44 种稿件在 6 月底之前可以交稿，但到 7 月 10 号为止实际交来的只有 12 种，交稿率为 27%。可见没有明确约束，中心催稿不理想。所以必须在合同中明确交稿时间，昨天大家对交稿时间有讨论，是不是可以以 4 月份的校点者自己上报的交稿时间为基点，以免大家无限制地向后拖。交稿慢有哪些原因呢？我们分析，这其中有中心的原因，有些底本不易复制到，等待时间长。如湖北省图书馆藏《春秋繁露义证》，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宋名臣言行录》，中央民族大学藏《读书录》，由于关系协调的不够，或馆方轻易不让复制，导致底本复制工作进行得很慢，影响了校点进度，也就影响了交稿进度。但校点者方面的原因更多，可以总结如下：1、主编没有积极落实校点计划、没有及时与校点者签订协议。2、一个人承担多部稿件，如史部黄怀信（3 种）、明清文集部分吴光（4

种)、清人文集陈絜(3种)等人,一种稿件拖,其他稿件就跟着往后拖。有些先生其他事务比较多,出国等等,拖得厉害。3、一部稿件几个人做,只要有一人不交稿,就无法组织审稿。4、一个人承担许多项目,《儒藏》的项目缺乏吸引力。5、财务运作不到位,有些校点者拿不到校点费,消极怠工,措施中说具体走访解决。6、退改率高,这不仅与进度有关,还与质量有关。原来曾经统计过,有过退改经历的稿子占到六成以上。目前在流程中的稿件(不含已出版),有184种做完了初审处理,其中一次通过的有57种,有127种至少退改过一次,退改率达到69%,还有不少稿件退改过2次,少数退改过3次。退改就要耽误时间,必然影响进度。

孙钦善:进度可以按照今年4月份的交稿计划来定,落实在合同里,总的交稿时间不晚于2011年,大致这样定,个别情况再说。

赵伯雄:从实际出发,不要例外太多,实现不了的目标定他干什么,为什么不拖一年或半年。

孙钦善:保证进度里面,我们报请教育部再发一个文,认可这个项目是教育部的重大攻关项目。

张鹤泉(吉林大学):关键是落实到校点者,年轻人需要,一个是项目的认定,一个是成果的认定。吉林大学社科处经过讨论,认为《儒藏》作为古籍整理可以纳入译著类,但还没有最后认定,认定后可以拿到2000元。

吴长庚(江西上饶师范学院):现在《儒藏》在各校是作为横向课题对待的,如果成为教育部的课题,属于纵向认定,比较好。

孙钦善:两个问题,部类主编的子项目认定以及校点者的成果认定。

张鹤泉:这也是影响进度的一个因素,认定项目与成果,比加钱更有意义。

陈恩林:现在评职称苦于没有国家项目,所以如果有国家项目的认定,更好。

周桂钿:校点者应该相当于教育部一般项目,部类应该相当于教育部重点项目。

李中华:《儒藏》工程是一个整体,最基层的校点者名也少、钱也少,要给予相当的重视。实际上几年前就呼吁,一直是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汤一介:这个问题,杨光司长在预备会议上已经说过了,教育部已经考虑这个问题了。

三、关于提高质量和加快进度的意见和建议

王承略:这次《儒藏》中心大幅度提高稿费标准,非常感谢,让我感觉我们的劳动得到了很好的尊重。通过这次大幅度提高稿酬,以后可以加快进度。从一个整理者的角度来说,不管水平高低,他需要中心和部类主编的指导性意见,他遇到的问题和

困难需要得到中心和主编的及时帮助和解决。

吕文郁：这次会议还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对于多数校点者而言，这是一件大好事。虽然校点费每千字增加二十块钱看起来数量不是很大，但是对大多数校点者，特别是年轻的学生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实际的行动，可以解决很大问题。会上很多人已经提到，稿酬增加是喜讯，但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政策方面的支持，这方面希望教育部能够尽快设法解决。因为上一次教育部会议我也参加了，当时教育部也有这样的意思，要发文件、解决问题，明确提出参与者的定位，但一年多过去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对于校点者和主编而言，这个问题比千字增加二十块钱校点费更重要，是大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教育部、中心能够力争解决。《儒藏》工程的参加者，都是学者出身，有些工作做起来不是那么内行，比如对外宣传、造舆论、筹集经费等等，对学者来说这些事都不内行，是否可以考虑专门组织几个人进行宣传，扩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儒藏》工程的重大意义，也便于下一步《儒藏》大全本的开展。

吴长庚：我们大家一致希望，把各单位的《儒藏》项目列为教育部的项目，当然我们整个项目本身就是教育部的重点项目，问题是延伸到下一步，有些东西就不一样了。课题申报是很复杂和困难的事情，我们都比较倾向于徐青森处长提到的第二种方案。不过，教育部主动去做不太现实，中心能否安排一位同志专门进行思考，形成文字，提交教育部转发，通过中心把各层次关系理清，请徐处长考虑解决方案。增加稿酬我们固然非常感谢，但大家更多考虑的是立项问题，这会对大多数校点者评职称起到重要帮助。在进度问题上，我们大多谈到的是校点者，我觉得中心的责编也需要考虑，这些书稿集中在他们几个人身上，他们也看不过来。比如我们有稿子交了半年，还没初审。因此，加快进度也需要加快审稿进度，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希望把这个环节同时也调动起来。

赵伯雄：由《儒藏》中心跟校点者直接联系，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以后跟校点者联系催稿，希望以中心为主，以主编为辅。

景海峰（深圳大学）：教育部对这个事情也很重视，希望给予切实有力的支持，现在主要是一个对接的问题。不过教育部既然投入了一千万而不是八十万，就不应该依照一般重大攻关项目的模式，看看中心和社科司如何想办法突破重大项目的模式，现在也使用了重大专项的说法，在课题类型上有新的思路。重大专项从投入和部里的重视程度看，应该比重大攻关项目级别要高，不能完全按照那个模式来管。目前二十七个部类，一个部类相当于重大专项下面的一个重点课题，或者是另外的提法，应该至少等同于教育部的一般项目。如果按照每个校点者计算，那么也是不现实的，但每个部类算一个项目还是可行的，那么每一种书算是项目下面的子课题。这样就不是三级，

而是两级。这样纳入教育部项目中，对于各个高校而言就比较便利，因为确实是一个课题，子项目也就有了应有的身份。以前教育部发的三个文件其实用处不大，无法落到实处，在项目课题管理上无法真正衔接。另外，按照现在的构想，大本也在考虑之列，如何更好地与精华编衔接，也应该开始考虑。精华编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后续如何链接，包括人员、具体环节等问题需要进行初步考虑。还有对外宣传，除了媒体、报刊对工程本身的宣传之外，还有内在的学术扩展。我们的几次会议基本局限于我们这个小圈子内，因此七年下来，外面的学界都是通过间接方式传递信息。从《儒藏》工程在当代的位置来看，应该是一个点，如何与当代儒学研究等面上的问题互动，暂时可能顾及不到，但从我们从事的专业来看，可以有所结合。比如古文献、儒学、思想史相关会议，或我们的工作会议，可以适当扩大范围，相关人员都能有所参与，对于扩大校点者队伍以及工程的影响度，都会很有好处。

严佐之：第一，刚才赵先生提到催稿的问题，大部分催稿还是需要主编去做。第二，刚才景先生提到上午徐处长的发言，感觉教育部的模式与《儒藏》不能匹配。其实，模式是可以创造的，他们是扁平的管理模式，我们在实际操作中是金字塔形的立体模式。如果以既有模式合并，肯定产生矛盾，但我们能否创造一个模式，把他们的扁平模式纳入我们的立体模式中来？可以把他们的中期考核、最终审定，都交给汤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儒藏》中心来考核，无需组织其他专家，按照《儒藏》内部的模式进行，按照重大项目子项目的要求，通过《儒藏》中心进行考核。中心则是受教育部委托，进行考核，包括学校内部的考核。在运作过程中，不知是否可以实行。为什么我们希望部类能够作为教育部重大项目的子项目呢，因为孙项目推动校点者积极性，而子项目并非推动主编积极性，而是推动各高校的积极性。徐处长之所以考虑再三没有实现，现在是否可以考虑创建新的模式。第三，刚才景先生也谈到扩大影响的问题。陈卫平先生的发言也让我深有感触，我们参会的时候责任心得到了加强，回去之后工作一忙就会逐渐淡忘。其实主编责任心很重要。我现在对《儒藏》中心也很有感情，很多老师都对《儒藏》中心，不仅是汤先生、孙先生、魏先生等等，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都有感情，确实你们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从长远观点来讲，我们的事业还要继续做下去。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儒藏》学术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每个部类主编应齐心协力，在感情上更加融洽，这些都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我们可以进一步联络感情，加深情谊，这些对于促进《儒藏》的进展都是有好处的。包括刚才景先生提到，召开《儒藏》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扩大宣传范围啊等等。

吕文郁：《儒藏》工程如果想做得更好，特别是如果进入《儒藏》大本阶段，仅满足于目前的规模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仅靠教育部负责组织如此大的项目，我觉得也

是不行的。《儒藏》的编纂，就其重要性和规模而言，不亚于《清史》，我们今后应该力争成为国家项目，投资规模至少向《清史》看齐。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努力方向就是让《儒藏》得到国家的承认，成为国家级的重大项目，可以委托教育部管理。这样我们的工作才好开展，影响也会更大。否则，我们会遇到很多麻烦。

朱友华（苏州科技学院）：《儒藏》大本能否成为国家级项目，其中重要的一点，要看精华编编出的质量，编出以后的影响。如果我们质量很高，影响巨大，乃至国际影响也颇为强烈，那就有望成为国家级项目，等同《清史》的地位。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心以汤先生、孙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有名望，有影响，有深厚的功力和资历。精华编的质量对大本能否成为国家级大项目、引起国家高度重视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责无旁贷，全心全意把目前工作做好。这次参会，我也很受感动，感到教育部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我也希望能列入国家级项目。这次参会，听到了喜讯，校点费和主编费都提高了，我们倒不是在意钱，而是这表明了中心对我们的关心。这次明确签订合同，我觉得合同有好处，可以免除可能产生的后顾之忧。

张希清（北京大学）：我们问题的焦点集中在项目的认定方面，从总的角度来讲是重大专项，起码每个参加者都是重大专项的参与者，从个人和学校的角度讲，每个人都要有正式立项的名分，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徐处长的第二个方案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可以由中心替他起草一个文件，和他磋商，由杨司长拍板下达一个文件，这样对于《儒藏》工程提高质量、加快速度以及争取各高校的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大家对史部都非常关注，开会前汤先生还说，我现在应该把《儒藏》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对我的批评、鞭策和要求。我现在一定把《儒藏》放在第一位来做，把北大历史文化研究所作为一个平台，从人力、组织上保证工作的进行。史部现在有很多有利条件，第一是本次提高稿酬、教育部下发文件等，正在开展工作的史部收益最大，会有很大的促进；第二，史部的校点者已落实，都是专门研究者，主要是教授，也有一些副教授和博士，博士都是参与者自己的学生，我对这个队伍还是很有信心的。第三，前面七年的经验史部都可以吸收借鉴。我在此表态，我们力争史部不拖后腿。另外，既然精华编之后还有大本，《儒藏》已经成为一个事业，我们都在为这一事业奋斗，要有事业心和使命感。我们的确资金紧张，能否在筹集资金上加大力度，比如在北大基金会设立一个《儒藏》基金项目，募集更多的资金；此外还有扩大宣传的问题，可否在会议上，比如国际儒联的会议、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会议以及其他相关学术会议上把《儒藏》作为一个项目或者课题进行宣传讨论，使学界都知道《儒藏》这个项目，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再有，把我们的网站做得更好，并在其他网站多发布消息，比如国学网、第一频道等等，把我们材料整理一下发布上去。

陈恩林：这几年参加《儒藏》的工作，很有感触。工程现在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而且中心虽然有行政管理，也有学术研究，我突出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学术中心，是学术人员管理学术，学术人员参与学术，中心都是学术人员，官味很少，在编纂和研究上民主气氛很好，历次会议大家都充分交换意见，进行民主协商，这个特点非常鲜明，给人温暖的感觉，有亲切感。真正是专家教授管理学术，与政府不同。另外，尽管还有很多项目没完成，实际上精华编已经接近尾声了，下一步工作，大本也好，进入研究工作也好，希望继续坚持中心的特点，并且能给参与者充分发挥个性的研究机会。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一切都进入自由发展的时代，唯有学术走进了计划时代，这是个缺点，形成一系列弊端。项目决定一切，压缩了个人的研究空间，文化就得不到发展。在研究阶段，不能违背学术发展规律，应该给个人自由发挥的空间。儒学要不断的变化适应时代，同时也要吸纳各方面的思想。实际上我们现在参与《儒藏》工程就是光复儒学，但我们光复的儒学，一定要与当前的时代，当前的文化发展方向逐渐融合。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学总有新的历史内容被提出来，向前发展推进。

周桂钿：刚才陈恩林先生的发言很多我赞成，比如要发展要研究要创新，首先思想要自由，否则在一个框子里如何进行创新。创新的生命在于自由。刚才张希清先生提到，希望和国际儒联搞一些合作。但儒联实际就是一个行政体系，他们并不重视学者。我也在想如何利用儒联做点宣传，一个是网络，一个是简报，有很多理事都是世界著名学者，如果上面是《儒藏》的内容，他们应该会感兴趣。《儒藏》工程的操作过程和高质量的成果，我认为都应该向全世界展示。

孙钦善：我们编纂《儒藏》，不仅是一个具体工作，也是一个学术工程，其中有很多学术问题，文献学的问题，包括思想的问题，哲学的问题，史学的问题。中心有一个刊物，名称是《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我们不空谈义理，一定要跟典籍联系起来。希望大家多关心和支持这个刊物。

魏常海：关于教育部发文的问题，徐处长提到的金字塔式运行模式，我们也不一定非要标出子项目、孙项目，因为不套入扁平模式，就无法解决在扁平模式价值评估体系中究竟是个什么待遇。名目不必改，就是重大专项，以下就是部类分项，再以下就是具体校点者承担的项目。运作体制和考核体制都不需要变化，教育部只需发文，承认部类项目相当于教育部重大项目或者重点项目，校点项目相当于教育部一般项目，不必非要另设体系。没有扁平模式的横向比较，就无法确定项目在价值评价中的定位。中心可以吸收大家意见，负责起草报告汇报给教育部。还有最后截稿日期，定在2011年12月31日，因为这只是交稿，有些大部头稿件后期运作时间就要一年。既然定了日期，这就是基本原则，大家也应有个共识。大部分稿件现在都有预定交稿时间，再

经过三方协商写入合同。另外，对于未交的稿件，就是种数虽然不多，但是册数非常多，三分之二以上都是一种一册或者数册，所以后期任务相当艰巨。

韩格平（北京师范大学）：如果中心能够解决项目认定问题的话，是否可以和合同文本的某些地方结合起来。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与会代表还逐项讨论了“《儒藏》精华编校点费提高及奖励办法”、“《儒藏》精华编委托校点合同”、“提高《儒藏》精华编整体校点质量的措施”、“加快《儒藏》精华编整体进度的措施”等文件，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汤一介先生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表示，这次主编会议开得热烈而富有成效，会后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将认真落实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他提出会后将着重落实五项工作：第一，对于与会代表普遍关心的《儒藏》工程作为教育部的重大专项，如何体现在各合作单位、主编及校点者的成果认定和评估上，将根据大家的意见形成一个正式建议，提交教育部。第二，将进一步完善委托校点合同和奖励办法等文件。第三，将通过扩大宣传争取教育部、各合作单位领导及社会各方面对《儒藏》工程给予更多重视和支持。第四，做好这次会议的纪要和总结，及时向教育部汇报，并及时与各合作单位、主编及校点者沟通。第五，在继续编好《儒藏》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有关儒家典籍与思想的学术研究。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李中华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常海教授、《儒藏》总编纂孙钦善教授分别主持了会议。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胡仲平整理）

《儒藏》精华编校点费提高及奖励办法（修订稿）

（2010年9月）

为保证《儒藏》精华编的校点质量,加快工作进度,进一步调动校点者的工作积极性,中心决定增加校点费。具体方案如下:

一、原校点费标准为30元/千字者增至50元/千字,40元/千字者增至60元/千字,60元/千字者增至80元/千字。校点费已拨迄者,按此标准补加。

二、按照合同规定时间交稿,且稿件质量达到要求,审稿过程中未曾退改者,书稿出版后,在新标准的基础上再奖励20元/千字。已交稿者,如稿件不退改即达到质量要求,亦给予同等奖励。已出版者,如稿件未曾退改过,亦准此补加。

三、按照合同规定时间交稿,审稿过程中只退改一次即达到质量要求,且按三方协议时间将稿件返回者,书稿出版后,在新标准的基础上再奖励10元/千字。已交稿者,如只退改过一次且已经返回或能按协议时间返回即达到质量要求者,亦给予同等奖励。已出版者,如只退改过一次,亦准此补加。

四、退稿另换校点人的稿件评定办法准“二”“三”两条。

五、主编费仍按照校点费总量10%的标准支付。

提高《儒藏》精华编整体校点质量的措施（修订稿）

（2010年9月）

为更好地保证质量，推进进度，在原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强调与补充以下意见。

一、强化样稿制度。校点者务须向主编先交样稿及“校点说明”，主编审查签字，经中心审稿确认后，再继续校点工作。为防止由于换底本引起的返工，“校点说明”中必须明确交待版本源流及确定底本校本的理由。

二、加强主编的职权。主编依据《〈儒藏〉精华编主编审稿细则》在各环节严格把关，认真审查。主编有权在未向中心交稿前退改、退稿。中心与校点者可以联系催稿，但未经过主编审查签字的样稿、全稿，中心不予接受。某部类的稿子二次退改率与退稿率超过一定比例的，采取一定的改进措施。

三、严格执行退稿制度。由于校点者态度不认真或自身水平不够，稿件退改两次仍不合格者，严格执行退稿制度。

四、提高审稿质量，坚持并完善初审、通审、抽审《细则》，落实“精审慎改”原则。

五、确定奖优原则。对于整理质量较高且交稿及时的校点者，适当增加校点费作为奖励。【具体见《奖励办法》】

六、校点者在校点前须对已有整理本充分调查，提交样稿时，须附有调查说明。如果已有整理本质量较高，难以超越，校点者应主动与主编、中心协商，尽量采用已有整理本，请该整理本原校点者依照《儒藏》体例修改后收入《儒藏》。如果已有整理本不够理想，校点者在校点过程中，应力争超越已有整理本。主编、中心在审稿过程中，须加强对校点稿与已有整理本关系的审查，避免出现雷同及抄袭。

加快《儒藏》精华编整体进度的措施（修订稿）

（2010年9月）

一、签订合同,明确校点者的交稿时间、退改返回时间,严格执行“合同”相关规定,有效保证交稿、退改进度。

（一）对于未交的稿件,原则上依据2010年4月《儒藏》中心责任编委与校点人确定的交稿时间在“委托校点合同”中确定交稿日期（“合同”第四条）。涉及字数、难度突出的稿件,具体计算可行的校点速度、交稿时间,写入合同。

（二）对于退改的稿件,由中心根据改稿的难度、字数提出退改返回时间,以电子邮件方式征得甲乙两方同意。一旦确定时间,严格按“合同”第六条相关规定执行。

（三）明确《儒藏》精华编所有稿件的交稿时间下限不晚于2011年12月31日。

二、对于手头稿件比较集中的校点者,分散其校点任务,先由主编指定新的校点者。如果主编没有合适的人选,由中心指定新的校点者。

三、对于问题比较集中的几个单位,通过走访解决其具体问题。

四、对于交稿及时且有质量保证的稿件,适当增加校点费作为奖励。【具体见《奖励办法》】